

中华道德五千年

⑤

春秋战国时期的道德实践和道德教育(之四)

冯克诚 蒋卫杰 宋武 主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华道德五千年

<5>

学术顾问:王炳照 阎国华

执行主编:冯克诚 蒋卫杰 宋武

春秋战国时期的道德实践和道德教育

(之四)

中国文史出版社

(京)新登字第 107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华道德五千年/冯克诚编.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8. 3

ISBN 7-5034-0922-3

I. 中… II. 冯… III. 伦理学-历史-中国 IV. B82.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04078 号 45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刷: 北京通县京华印刷制版厂

装 订: 密云渔家台装订厂

经 销: 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印 张: 100 个印张 字数: 2000 千字

印 数: 1-3000

版 次: 1998 年 2 月 北京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28.00 元 (全套 20 本)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工厂负责退换。

◇ 目 录 ◇

人格孟子培养与训练	(1)
孟子论道德自我完善的心理活动	(14)
孟子论家庭人际关系的心理活动	(21)
孟子论社会人际关系的心理活动	(22)
孟子的德育原则和方法	(27)
孟子的力行践履与个体发展	(41)
荀子礼仪化性的德育思想	(45)
荀子对儒法道德思想融合的贡献	(70)
《礼记》和《孝经》中的道德理论与德育思想	(79)
《中庸》中道德理论与德育思想	(80)
《大学》的德教纲领	(84)
《礼运》中的道德理论与德育思想	(87)
《礼记》中的早期品德修养和行为礼貌教育	(90)
《礼记》论仁、义、礼、乐之教的巨大作用	(94)
《礼记》中的儒者（教师）的独立人格	(99)
《礼记》中的儒者（教师）的职业意识与道德修养	(101)
《孝经》的德育思想	(105)
《乐记》中的道德理论与教育思想	(109)

商鞅“以法为教，以史为师”的道德实践与德育理论.....	(113)
韩非法术势合一的道德实践与德育理论.....	(118)
道家游世型的理想人格.....	(131)

人格孟子培养与训练

创立人格教育是孟子对孔子“教人做人”思想的重大发展。“仁”在孔子学说中占有重要地位，故后人曾用“仁学”来高扬孔子的民主精神。孔子希望培养以仁为己任的志士，但是，他所论“仁”的内容尚处于无所不包、义理纷呈的状态。而孟子，却率直地将“仁”概括为“仁也者，人也。”（《尽心下》）这无疑是说“仁学”就是“人学”就是教人做一个真正的人，做一个人格完美的人的学说。孟子对孔子“仁”的训释，使孔子教人做人的思想，明确打上了“人格教育”的标帜。他还提出，天有“天道”，人有“人道”，教育乃是实施“人道”，所谓“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数，则近于禽兽。”（《滕文公上》）意思是说，人如果只享有人的物质生活而不接受教育，就是没有行人之道，那必然会丧失人格，沦为禽兽。所以，教育是使人有人格所不可缺少的条件；换言之，造就人格，则是教育的根本任务。

学校教育在孟子之前，有不同的称谓和不同的教育内容，所谓“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滕文公上》）这是名称上各代的不同。至于“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滕文公上》）则是其内容上的差异。孟子借用“学”来加以统一，指出其内容乃是“明人伦”，即“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滕文公上》）“人伦”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当时便是做人的根本，因此“明人伦”之教就是教人怎样做人。正是孟子运用孔子倡导的“正名”方法，将人格教育定为学校教育的基本内容。这是他创立人格教育的重要标志。

人天赋平等，是孟子人格教育思想的重要特点，也是他对中国教育史和世界教育史所做的杰出贡献。他是从“类”的角度论证了人天赋平等的合理性，实施人格教育的可能性。他说：“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告子上》）揭示了同类事物具有“共性”的道理，这种“共性”对人类来说也不能例外。人类的共同特性既表现在生理上，也表现在道德修养上。所谓“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告子上》）讲的就是人类共同的生理感受，这是人类进行思想情感交流、实施教育所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孟子列举了一系列典型事例加以证明，其中有历史上的烹调高手易牙，有音乐大师师旷，有举世无双的美男子子都。他指出，为什么天下的人都希望能吃到易牙的菜肴？是因为“天下之口相似也”；为什么天下的人都希望听到师旷的音乐，是因为“天下之耳相似也”；为什么天下的人都公认于都容貌姣美，是因为“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由于人类具有相同或相似的生理功能及感官需要，这就为接受教育创造了条件。这种“类”的特征，还反映在道德认识上，使人们享有平等的成仁与为圣的权利。

人格教育的核心是道德教育，孟子从同类“举相似”出发，明确指出在道德修养上，人的天赋也是平等的，响亮地提出了“圣人与我同类”（《告子上》）的论断。这一命题的提出，在历史上犹如霹雳惊雷，具有震聋发聩的作用。在氏族社会，圣人为血统高贵者的“专利”，至孔子方才提出了“性相近”的见解，在世卿世禄制的樊笼上凿开了一个小孔，而孟子却进一步提出“性相同”，认为在道德上人人享有平等的权利，指出庶民也可以成仁为圣，无疑比孔子又进了一大步。孟子的依据是人的生理功能相似，必然具有相似的道德认识

功能，所谓“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此处所说的“心”是道德认识的代名词。孟子在当时尚无能力运用科学证明的方法论述人类具有相同或相近的道德认识能力，但是，他采用了“合理推理”的方法，从人类生理功能的相同或相近，推论出道德功能的相同或相近的结论。这虽然使具有复杂的阶级性和社会性的道德问题简单化了，但是也不失为一种“原始”的证明方法，他使人们的理论思维大大前进了一步。孟子还以历史上的圣人为例指出，“庶民”和“圣人”的差别只在于圣人能够运用理性的精神来实施仁义。例如虞舜其所以为圣，就在于他能懂得天下万事万物所含的义理即“明于庶物”，又能详细地考察做人的道理即“察于人伦”。他行仁、行义，是出于内心的道德“自觉”即“由仁义行”，而不是为沽名钓誉，“非行仁义”（《离娄下》）。其他诸如禹、汤、文、武、周公等人成圣、称王，也与虞舜一样，并无任何神秘之处，不过都有深通做人之理的特点。孟子认为如果庶民也能像他们那样发扬理性精神，提高道德自觉，同样可以学为圣人。所以他十分肯定地说：“尧、舜与人同耳”（《离娄下》），并得出了“人皆可以为尧、舜”（《告子下》）的结论，激励人们进学修德，做一个人格高尚的人。孟子关于人天赋平等的思想，为孔子创立的推己及人道提供了理论依据。他的天赋平等说，抹杀了道德的阶级性，但却揭示了道德的社会性，指出人与人之间在道德情感上和道德认识上是可以相互沟通的（当然，这种沟通只能是有条件的），并以此为据论证了道德教育的可行性，可以采用推己及人的方法来进行人伦道德教育。他还以此作为思想武器来推行“德治”与“仁政”，告诫统治者要关注老百姓的利益，做到“推恩于四

海”，并发表了著名的道德格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梁惠王上》）历史上，统治阶级曾利用孟子天赋平等的思想掩盖阶级压迫和血腥的统治。但是，不能因此而无视孟子这一思想还对统治者的横征暴敛起过一定的制约作用，更不能抹杀孟子在一这思想中所表现的“为民请命”的精神风格。人天赋平等的思想，使孟子的人格教育观具有鲜明的民主性，并为中华文明增添了光辉一笔。据说这一理论曾远传欧洲，为“百科全书”派所叹服，被用作他们反对中世纪封建势力的有力思想武器，显示了孟子人格教育思想的历史价值。

孟子创立的人格教育初步具备了一定的结构。他以“四端说”为实施人格教育的基本出发点，以实现“仁政”和培养“大丈夫”为人格教育的基本目标，以人格的力量来培养人格为人格教育的基本动力，以“成人在人境”为人格教育的基本途径。而这一切都是围绕为确立封建人伦关系这一内容服务的。下文将分别加以论述。

1. “四端”与人格教育的基本出发点

孟子为人格教育设计了一个基本的起点，他称之为“善端”，就是培植完美人格大树的萌芽，并为实施道德教育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路。要塑造一个人格完美的人，是一项十分复杂的“教育工程”，必须经历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应以什么为起点？这的确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构成一个人美德的因素很多，而哪些因素是关键性的、核心的因素，可以构成道德教育的基本起点呢？孟子率先提出了这样重要的命题，仅此一点，就是他对教育发展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孟子在道德教育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

“善端说”，即以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为造就完美人格的人所不可缺少的“萌芽”。

孟子的“善端说”，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那就是将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都视为人的先天素质，陷入了唯心主义先验论的泥潭。但是，摒弃“善端说”的先验性，不难发现，孟子为人格教育规划的起点，是有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的。

首先，四个“善端”涉及了人的情感与理性两大领域，具有全面性。孟子对四个“善端”未加分类，也没有阐述为何只以此四“心”为“端”的原因。不过，不能因此而忽视了这一理论的深刻思想。仔细分析可知，四端之中的前两端：恻隐之心和羞恶之心，侧重揭示了道德情感培育的基本出发点；四端之中的后两端：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侧重揭示了道德理性教育的基本出发点。我们常说的道德教育的“知、情、意、行”，就其大端而论，似可归纳为情感与理性两大类。四个善端正包括了这两个部分，可谓全面矣。

其次，四个善端还具有道德教育的普遍性。所谓恻隐之心，就是孟子常说的“不忍人之心”，就是不忍心残害同类之心，这是人类生存与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心理品质。欧州的大思想家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文中指出：“怜悯之心是一种自然的情感，由于它调节着每一个入自爱心的活动，所以对于人类全体的相互保持起着协助作用。”从人类起源与发展的历史可知，在人类初生之时，曾经有过“人相食”的阶段，这是人类生产力水平低下所造成的。随着人类文明的进化 and 生产水平的提高，人的“不忍人之心”得到发展，人类社会终于走出了“人相食”的阶段，脱离了“兽性”，光大了“人性”。卢梭认为怜悯心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发扬这种恻隐之心，是人脱离“兽性”、发展“人性”所不可缺少的教育内容，卢梭把它当成人格教育的起点，是很有见地的教育主张。道德教育有两种激励机制，一是正激励，一是反激励。恻隐之心属于正激励，而羞恶之心则是一种反激励。耻于为非，是人道德自觉的重要表现，是这种自觉在道德情感上的反映，是人类保持人格尊严的情感基础。培育羞恶之心，是孟子对孔子知耻教育的发展。道德教育的经验证明，只有悉心保护和扩充人的羞恶之心，才可能使人具有趋善拒恶的能力，逐渐形成独立而完美的人格。

道德理性的教育又应以什么为基本出发点呢？换句话说，哪些萌芽形态的心理活动如果善加培育就可以滋生出人的道德理性精神呢？孟子认为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就属于这方面的“善端”。所谓“辞让之心”，它是组建人类群体所不可或缺的规范。孟子深通孔子教人做人思想的精髓，他不是教人做一个独立于人群或社会之外的孤立的个人，而是要教人做一个与人类群体相协调的并能安然生活于其中的一个人。要教人做这样的人，就需要使之心中有他人，懂得自己是群体中的一员这个最起码的道理。辞让之心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萌芽，人只要有这一“善端”，就不难培养起乐群、利人以至造福天下的道德义务感和道德责任心。因此，以“辞让之心”作为培养道德理性精神的一个重要起点，是可取的。孟子还感到，培养人的道德理性，与人的生活态度直接有关，“是非之心”，就是一种最起码的理性的人生态度，它不是“混世”，不是玩世不恭。一个人如果能有遇事问个是非的心态，就有可能进一步提高其道德认识水平，也才有可能培养持志守道的清醒头脑，使之在邪恶的诱惑面前不为所动，最

终修养成一个人格高尚的人。总之，孟子的“善端说”，具有道德教育的普遍性，在今天仍然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2. 人格教育的基本目标

孟子倡导人格教育，有鲜明的政治目的，即为实施“仁政”服务。他从两个方面论述了这一教育目标：其一，就培养治术人才而论；其二，就教民而论。孟子认为只有人格教育才能造就推行“仁政”的治术人才，因为这种人能发扬人格应有之“善端”。据《孟子·公孙丑上》记载，他曾以历史上的圣君明主为例说：“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这就是说，有善良人性的人才能实行“仁政”。他指出以人格高尚的君子治理国家，他们必然会使人性的善端得到发扬光大，“皆扩而充之”，这种道德的力量将如“火之始燃，泉之始达”，用以感召天下人心，则“足以保四海”（《公孙丑上》）。孟子还指出，这种具有勃然兴邦的道德修养，不是与生俱来的，必须经过教育才能获得。他仍以历史为据加以论证，例如商汤是先向伊尹受教，然后才把伊尹当臣子使用，从而取得了“不劳而王”的成就；桓公也是这样，是先向管仲就教之后，才使之为臣，从而取得了“不劳而霸”的业绩。故而，孟子指出君主应当“学焉而后臣之”（《公孙丑下》），人格教育对于为君是不可缺少的。

就教民而论，孟子认为人格教育囊括了封建纲常的基本要求，是社会教化的中心内容。孔子创立的“仁学”，强调为人的根本是维系血缘亲情。孟子对此表现得更为强烈，他说：“亲亲，仁也。”（《告子下》）视“亲亲”为做人的标志。又说：“仁之实，事亲是也”（《离娄上》），“事亲，事之本也”（《离娄

上》)。孟子从历史发展的高度论证说，在远古时期，由于后稷的倡导发展了农业，使民人能够安居乐业。但是，尧舜却认为老百姓“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滕文公上》），对此深为忧虑，因此命“契为司徒，教以人伦”（《滕文公上》），使百姓懂得做人的大道理。孟子在此提出了著名的“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滕文公上》）他认为只要使这类做人的道理深入人心，必然可以取得长治久安的统治效果。故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尽心上》）以上论述说明，孟子的人格教育是以推行“仁政”为其政治目的。他的这一教育主张，在战国纷争之时，被视为“迂阔”之论，无补于统治者以武力争伐天下。但是，在整个封建社会，特别是在封建统治者进入“治天下”阶段时，却对巩固封建统治发挥过难以估量的作用。我们应当怎样理解这一历史现象呢？

孟子人格教育的基本内容，特别是他的“善端说”，在哲学上属于唯心主义的理论。以往人们在分析这一问题时，常常受一种“左”的阶级论的影响，认为孟子正是在四个“善端”的基础上提出了“仁、义、礼、智”的道德规范，这四项道德规范属于封建伦理道德的范畴，因此认为孟子的“善端说”完全是出于阶级的需要，才做出如此唯心主义的杜撰。这就无视了“善端说”的社会现实基础，也无从解释人格教育在道德教育史上其所以发挥重要作用的原因。

孟子人格教育论是以承认不承认和维护不维护血族亲情作为有无人性或人格的标志，因此他将仁、义、礼、智以及“五伦”都视为人先天具有的秉性，为封建纲常的推行，提供了理论依据。甚至认为人们只要具备了处理人伦关系的本领，

也就可以治理好天下国家。这当然是十分典型的唯心史观。不过，孔子和孟子关于人格教育所得出的结论，尽管是唯心主义的，但是，它却是我国自远古以来，整个社会人情的集中反映，它有着历史的、现实的和社会的存在基础。我国自原始社会末期就走上了农业社会的轨道，虽然经历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等不同的社会形态，但始终未能超越农业社会的范畴。当代学者认为：“社会生活依重农业、土地，社会的结构不可避免地要呈现血族聚居的方式。”（《孟子思想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5，2页）诚然是这样，这种血族聚居的生活方式在中国延续了千百年之久。它使长期生活在这种社会环境中的人很自然地会将“亲亲”与孟子所说的四个“善端”，看成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从而得出了“亲亲为仁（即人）”的结论。孔子和孟子深刻地把握住了我国亘古未变的社会情态，故将人伦代替人格，又以这种人伦化了的人格教育用来为实施“德治”与“仁政”服务。由于这一教育主张符合我国古代的国情，所以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

孟子创立的人格教育除了有其政治目标之外，还有关于“人的发展”的目标，那就是培养“大丈夫”的人格模式。这一论述见于《孟子·滕文公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一观点受到当代学者张岱年先生的盛赞，他说：

孟子提出了人格标准，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一人格的崇高标准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一切进步的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艺术家都受到这个人格标准的影响，历代伟大的民族英雄也都受到孔孟之道的熏陶。（《孟子思想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5，2页）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对此也有高度的评价，他在临终前的一封信中写道：“平时要以‘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达者不恋’的精神培养学生和我们自己。有事则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美人不能动’相勉励。”（《陶行知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649、158页）为什么对孟子的“大丈夫”品格会有如此崇高的评价呢？从教育的角度分析，不难发现，孟子揭示了做一个顶天立地的有人格的人所不可缺少的三种品德，也提出了要想成为这样一个人所必须回答的三个问题，那就是：要正确对待金钱的诱惑，处理好富贵问题；要正确对待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处理好贫贱问题；要正确对待强权的胁迫，敢于直面威武的暴力。这三项教育内容经过历史的检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至今仍然是我们培养有道德的革命者所不可缺少的。孟子能够如此敏锐地发现并抓住了道德修养中的这一重要内容，将它们归纳在一起，形成了一组不可分割的系列，从而大大提高了我国古代道德教育的水平。不过孟子提出这一人格标准是为其培养治术人才服务的，即是为了培养“人上人”。陶行知则摒弃了孟子这一糟粕，将上述经验用于培养“人中人”，他告诫学生说：“做人中人的道理很多，最要紧的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陶行知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649、158页）使得孟子这一道德教育的经验，又重放异彩！

3. 人格教育的基本动力

在中国思想发展史和教育上，孟子继承和发扬了孔子关于人人都有人格价值的观点。张岱年先生对此有过重要的评价，他说：

最值得注意的是孟子所讲‘人人有贵于己者’的学说，这就是肯定人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这个价值是天赋的，不可剥夺的。这是孟子对于奴隶制度把劳动者看成奴隶的谴责和批判。孟子以后，荀子、董仲舒、王充、刘禹锡以至宋明理学家都肯定人的价值，这所谓人的价值不是资产阶级所强调的个人价值，而是人格的价值。这所讲的人固然都是抽象的，但是在历史上，这种肯定人格价值的思想还是有进步意义的。（《孟子思想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

孟子曾经提出过“达尊三”的观点，他说：“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公孙丑下》）他将“德”即个人的人格修养，放在社会地位“爵”和年高“齿”之上，认为它是世上很尊贵而最有价值的。在等级森严的宗法社会，孟子能够如此评价人格的价值，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孟子十分重视人自身的人格力量，认为造就完美人格的人，必须调动人本身的人格力量，他将此视为人格教育的基本动力。孟子这一思想直接继承了孔子“为仁由己”的主张，他反对怨天尤人，而强调“祸福由己”。孟子曾经告诫弟子说：“祸福无不由己求之者，《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公孙丑上》）在道德修养上也是一样，不能听天由命，而要积极努力。孟子经常用“尧舜与我同类”的思想激励学生，要他们在进德修业的过程中不自悲不自弃。他还指出人的个体人格具有独立性，究竟什么样的人应完全由自己负责，他曾说：“鸣鸡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鸣鸡而起，孳孳为利者，蹠之徒也。”（《尽心上》）正因为个体人格是独立的，所以世上才有君子与小人之分，要想成为君子，就要靠自己

努力。

对于如何运用人格的力量来进行人格教育，孟子还提出了自尊、自重、自爱的修养原则。他告诫弟子，建功立业需要有一定的条件，唯有进行人格的自我完善不需要他人给予什么条件，而全在自己。他曾讲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尽心上》）的话，还说：“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滕文公上》）都在于说明在人格的提炼上，每个人都是自主、自制和自决的。所以能否成为一个人格高尚的人，全在自己的努力。运用人格的力量来培养人格，还必须具有敢于和逆境斗争的勇气，做到“达不离道，穷不失义”（《尽心上》），应持之以恒地追求道义。为了坚持道义，对上可以做“不召之臣”，不阿谀奉承。在君主面前不失自己的独立人格，对于不仁不义的国君可以视之为“一夫”，而不以君主待之。在非常之时，为了坚持自己的理想人格应当做到“舍身取义”。孟子“舍身取义”的思想，将对理想人格的追求推向了最高境界，对于培养仁人志士的骨气曾经起过重要作用。

4. 人格教育的基本途径

孟子继承了孔子“入世”的教育思想，他所要培养的人格高尚的人，是生活在社会之中并将为社会效劳的人。这一明确的思想使孟子在充分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同时，始终不忘环境对人成长的作用。而且他本人就受到过“孟母三迁”的熏陶，深深知道后天环境对人的重大影响。孟子曾经指出，经济条件不同，弟子的品行也有不同，所谓“富岁于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告子上》）意思是说，丰年一般民众不肯多干活，少年们也多沾染上懒惰的毛病；而在荒年，不少人